

# 评左拉的《娜 娜》

郑永慧

法国作家爱弥儿·左拉于1840年4月2日生于巴黎。父亲弗朗索瓦·左拉是法籍意大利威尼斯人，工程师；母亲埃米莉·奥贝尔是法国博斯人，手工艺人的女儿。左拉七岁时，父亲突然逝世，家庭陷入贫困，左拉要靠助学金才能继续在中学读书。1859年左拉在巴黎参加中学毕业理科会考，两次都名落孙山，于是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愿望，在家闲居两年。在失业期间，左拉读了很多书，也尝试过写诗和短篇小说。他中学时代的朋友，后来的印象派大师塞尚，当时也在巴黎，他们就经常联袂去参观画展和画室。左拉在不得志时并不消沉，相反，他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对将来抱着极大的希望。1860年，他写信给好友巴耶说：“关于前途问题，我一无所知。如果我决定走文学家的道路，我愿意按照我的格言去做，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我不想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这倒不是我有野心，想当一个学派的领袖……可是我想找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从我们时代的平庸作家群中脱颖而出。”他的豪言壮语后来果然实现，左拉成为自然主义的奠基人和主将。

左拉起初醉心于浪漫主义，受过缪塞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迷上了现实主义，热烈地崇拜巴尔扎克。他很想学巴尔扎克的样子，写一部自己的《人间喜剧》，但不知从何着手，他又不愿意草率从事，怕人家说他抄袭。这时候，给他启示的是科学。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发明有了蓬勃的发展，人类生活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科学似乎是万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任何奇迹都能出

现。左拉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读过泰纳的《艺术哲学》，也读过吕卡的《遗传论》，最后给他启示的，是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左拉认为找到了一种正确的写作方法：只要在小说创作中采用严格的科学分析，小说家就能同科学家一样工作。他天真地想，到目前为止，作家只依靠他们称为灵感的东西来写作，得不出科学的结果，这种混乱状态必须结束。从今以后小说不再是供人玩赏的东西，科学家在实验室，小说家在书斋，追求的都是同一目标：揭露和认识真实。贝尔纳在人身上所作的实验，左拉将施诸人的情欲和社会环境；他将指出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许多现象汇集的结果；只要研究这些现象，就能理解人而且正确地描写人。左拉认为，实验小说的时代终于来到了，只要实验小说家指出社会的弊病，政治家就能确定医治这种弊病的药方。左拉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去创立自然主义，又把这种自然主义理论，应用到写作《鲁贡—马卡尔家族》中去的。

左拉的自然主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左拉认为作家就象解剖室里的医生，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要作科学的分析，并且如实地加以描写；他要求作家大规模地搜集资料，尊重客观现实，敢于把血淋淋的现实，投到读者眼前；他把作家从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事实的科学调查者，把纯粹想象的文学，变成了探索研究的文学。第二，左拉认为，作家应该利用实验医学、生理学以及遗传、环境等先进科学知识，去解

割人和观察人。左拉说：“我们的主角再也不是十八世纪的纯粹精灵或抽象个人了，他是我们目前科学的生理学主体，由器官构成的生命，而且不断地受到环境的影响……所有感官都对心灵起着作用。心灵的每一个动作，都为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所左右而加速或放慢……孤立的心灵在虚无中独自运行的概念，已经成为虚构的了。”这一点对后世作家有很大影响，我们当代不是有许多作家把医学的新发现，如精神分析和意识流，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去吗？第三，左拉在写作上创造了崭新的艺术风格：为了如实地描绘现实，在描写下层人民时，就使用下层人民的语言，那怕是最粗鲁的语言；在作心理描写时，充分利用有关心理分析的一切法则；左拉尤其擅长描写群众场面，能把壮丽的或者混乱的群众集会交代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法国除了里昂的缫丝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没有产业工人。十九世纪下半叶，巴尔扎克死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经济继续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新兴的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产业工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对第二帝国的现状普遍不满。左拉的自然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因此左拉一开始，就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第二帝国时代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腐化堕落，刻画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洋溢着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精神，每出版一部，必然引起当时的“正人君子”痛心疾首，哗然责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左拉的自然主义继承了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的未竟之业，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激起人民群众对现状的不满，这是自然主义的一大功绩。

左拉是个生活严肃的人，日子过得简单朴素，从来不寻花问柳，说话老实，对朋友

忠诚。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贞洁的。他的唯一乐趣就是写作，他在壁炉架上刻了一行金字：“没有一天不写作”，他活着就是为了写作。他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热爱人民，维护真理和正义。一八九四年法国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德莱福斯事件，为了替德莱福斯辩护，左拉于一八九八年勇气百倍地在《震旦报》上发表了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结果被迫匆匆出逃英国，在英国流亡一年以后才于一八九九年重返法国。

1902年9月29日，左拉从梅塘避暑归来，回到巴黎的住所。房间有好几个月没有人住，比较潮湿，左拉叫人生了旺火，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上床睡觉。半夜，左拉夫人醒过来，觉得头痛、恶心，挣扎着起床，走到盥洗室就呕吐了。左拉夫人退回卧房时，看见左拉从床上起来，刚站直就跌倒在地板上，左拉夫人想去拉铃叫人，自己也无力跌倒在地。原来他们两人都中煤气毒了。第二天九点钟，仆人们打开房门，发觉左拉已死。左拉夫人则被送到医院抢救。十月五日，举行葬礼，巴黎群众数万人聚集起来哀悼这位一代文学巨匠，盛况同雨果的葬礼不相上下。法国名作家法朗士致悼词，他说：“左拉是善良的。他象一切伟大人物一样，天真而纯朴。他有很高深的道德。他用粗犷而正直的手法来描绘道德败坏的事。他的表面上的悲观，散布在他的书页上的忧郁，掩不住他的真正乐观和他的坚决相信智慧和正义。他的小说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在小说中对这个游手好闲和百无聊赖的社会怀着强烈的仇恨，他攻击‘金钱万能’这种时代病。他是民主主义者，他从来不欺骗人民，他尽力向人民指出：无知会被奴役，酗酒十分危险，它能使人民愚昧地、无抵抗地陷入一切形式的压迫、贫困和耻辱中。他在哪里见到社会罪恶，他就在哪里战斗，这就是他的仇恨……”

左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仇恨，充分表达在他的辉煌巨著《鲁贡—马卡尔家族》中。这部巨著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每一部小说都以鲁贡—马卡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为主人翁，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部巨著出版第二卷时便有许多人向检察官控告左拉伤风败俗，以后《小酒店》、《娜娜》、《萌芽》等出版时，每卷都受到攻击，被骂为“污秽文学”。尤其是《娜娜》，因为描写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下层的妓女，触及资产阶级的痛处，最受资产阶级及其卫道者们的攻击和责难。

《娜娜》是《鲁贡—马卡尔家族》中的第九卷。主角娜娜本来是《小酒店》中的人物，是洗衣妇热尔伟兹和洋铁匠库波的女儿，名叫安娜，小名娜娜。六岁时就十分调皮，专门作弄教师和同学，在同龄的小孩中横行霸道，喜欢窥探成人的所作所为；十五岁时，在卖花店当学徒，被一个富有的钮扣商人勾引，后来跟随这个老商人私奔了。到了《娜娜》这部小说中，娜娜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歌剧院女伶，她上演下流的喜剧，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其中有王子、侯爵、伯爵、银行家、贵族子弟、军官、新闻记者等等。他们中每一个人只要和娜娜相好，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厄运，有的破产，有的自杀，有的入狱，还有人为了娜娜的缘故，容忍自己的妻子与人通奸，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娜娜的情夫，自己还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娜娜是腐蚀剂，她在不知不觉间使全巴黎腐化而解体，她的所作所为是贱民对上层社会的报复。最后，娜娜死于天花，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百分之百的腐烂，因为连腐蚀这个社会本身的工具，也腐烂了。

娜娜是作者塑造得很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她有相当复杂的性格：作为妓女，她用肉体迷惑男人，使他们倾其所有供她挥霍，她习惯于过奢侈腐化的生活，还搞同性恋爱，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子。然

而恶劣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能使她丧尽天良，她依然是一个本性善良，富有同情心，开朗乐观的姑娘；她还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幸福，她肯牺牲一切。应该说，娜娜在本性上是善良的。她的不幸遭遇，造成她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的原因，不能用惯常人们所说的“自古红颜皆薄命”来解释，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娜娜的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工人，企图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生存权利而不断挣扎；父亲原来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在娜娜出生之前并没有什么恶习，受了工伤以后才开始酗酒。所以左拉说娜娜的“四、五代祖先都是醉鬼……历代穷困和酗酒的遗传，感染了她的血统”，是没有根据的，无非是拿自然主义的理论牵强附会地套在娜娜身上。娜娜之沦为妓女，不是由于遗传，而是因为“家贫万事哀”，父亲喝醉了酒，无缘无故地打她，使她愤而离家出走，一进入社会，立即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逼迫和毒害下堕入悲剧的深渊。父亲为什么酗酒？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工伤事故失了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看似偶然，实则具有很大的必然性，所以归根结蒂仍然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对于当时的黑暗社会，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写照：“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娜娜踏进了这样的社会，当

上了歌剧演员，一炮而红，成为名妓，她在微贱时期所梦想的生活一一实现，但是一旦陷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就逐步沾染恶习而不能自拔，而且永远摆脱不开对金钱的依赖。恩格斯说过，卖淫制度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就是说，妓女不仅因卖淫而受害，而且被卖淫生活腐蚀灵魂。娜娜也是如此。她的灵魂被腐蚀了，纵使她极端厌恶卖淫生涯，却又无法打破套在她头上的枷锁，这就是造成她性格复杂的原因。她腐蚀男人是不自觉的，就象她啃一个苹果一样。乔治自杀以后，她抱着满肚子的委屈向米法伯爵哭诉自己的无辜，她说：“亲爱的，这是我的错吗？你如果是个法官，你会判我有罪吗？我既没有叫菲利普去偷钱，也没有逼着这个坏孩子自杀……他们到我这儿来，干了很多蠢事，我不幸极了，他们还把我当作不正经的女人……”这是她对现实的生活提出的微弱抗议，我们应该同情她的抗议，对造成她不幸的制度提出谴责，否则我们就同机器出现初期，工人不去设法砸烂剥削制度，而去砸烂机器一样天真幼稚。

娜娜不仅在肉体上受尽折磨，而且在精神上也备受摧残。她是王孙公子的玩物，是家具商、供应商、以至理发师、老鸨的俎上肉，只要她出卖肉体得了一点钱，这些人便会蜂拥而至，大家分一杯羹。她居住在华丽的邸宅里，没日没夜过着穷奢极侈的巴黎生活，内心感到空虚而寂寞，不得不想法设法找些新花样来消磨时间。她厌倦了卖笑生涯，十分羡慕从良的妓女伊尔玛，梦想将来自己也会有这样一个归宿，这说明她有同过去的生活习惯一刀两断，从新过简朴而正当的生活的良好愿望。她还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幻想，憧憬着同方堂过一夫一妻的小康日子，一直忍受方堂的毒打，结果幻想还是破灭了。她经常叹息：“男人缠得我好苦！”这正是普天下妓女共同的叹息，也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妇女对卖淫制度的

控诉。

一位英国文学评论家说过：左拉在《娜娜》一书中尽力去描绘一个堕落的女性，结果适得其反，在他笔下出现的是无数道德败坏的男人。这些男人都是些达官贵人，第二帝国的支柱，他们有钱有势，可以迫使娜娜做他们的泄欲工具。他们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左拉用娜娜主演的《金发爱神》一剧，对他们的道德作了很好的讽喻，他们就是剧中告状的凡人，他们愿意自己的妻子偷汉，以使自己能够自由享乐。米法伯爵夫妇俩的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娜娜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丰满、美貌、乐观、天真、陷于泥坑而不能自拔的姑娘。她虽然日夜同资产阶级上层厮混，但是她身上仍然不时闪耀着来自下层人民的纯朴善良的光辉。她从繁华的巴黎来到乡下，望见广阔的天空，翠绿的田野，闻着树丛的香味，走进丰美的菜园，不由得陶醉了，竟冒着大雨采摘草莓。这幕动人的情景，显示了娜娜的精神境界。娜娜还是一个慈祥的母亲，真诚地爱着她的非婚生子小路易，不惜用出卖肉体所得到的肮脏钱来供养他，最后竟为照顾儿子而死于天花。她容易受骗，她受过方堂的骗，受男女仆人的骗，受冷酷而又自私的纨绔子弟的骗，她天真到不会主持家计度日，亏空了钱只能靠出卖肉体来弥补。这同那些“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的达官贵人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语了。

左拉把娜娜喻为金苍蝇，说她是一种毁灭性的酵素，落到男人的身上就会把他们毒死，她在不知不觉间使全巴黎腐化而解体，她的所作所为是对上层社会的报复。殊不知娼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剥削者总是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妓女丧失了人的尊严，沦为男人的泄欲工具，应该是被害人，金苍蝇其实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这些人毒害了娜娜，使娜娜成为这个社会的腐朽因素之

一。作者的同情其实是在娜娜方面，他在本书第十章描写娜娜和萨丹在吃饭时故意拿他们的微贱出身来侮辱同桌的达官贵人，在第十三章又写娜娜要米法伯爵穿着朝服来见她，她在背后用脚踢他，心里想着是踢在皇帝陛下身上，后来她又把庄严的朝服践踏得粉碎。这就是卑贱者的报复。这固然刻画了娜娜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但是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作者对第二帝国的憎恨。本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米法伯爵。这位宫廷侍卫长自幼虔诚地信奉宗教，长大了规行矩步，是一个十足的

“正人君子”。后来遇见了娜娜才开始堕落，他的堕落显然不是生理或心理上的原因，而是环境造成的：处在骄奢淫逸、卑鄙龌龊的社会中，家庭教育、宗教约束都丧失了力量，无法洁身自好，只有随同这个社会一起沉沦下去。左拉用米法伯爵来象征第二帝国的上层，米法堕落得越彻底，越能解作者心头的恨。左拉早在1865年第二帝国还很强大的时期，就预感到这个腐朽的社会必然崩溃，但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左拉对他所憎恨的社会，只能够设想：贫苦出身的娜娜，把上层人士一个个腐化，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报复。结果左拉所写的，其实不是一个妓女短暂一生的历史，而是第二帝国达官贵人们的一连串道德败坏史，是一篇对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书。

娜娜是作者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典型妓女，即使在今天，西方国家里还有千千万万的贫家女儿在走着娜娜所走过的道路。与左拉同时代的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赞美《娜娜》说：“多好的一本书！……那位左拉是一位天才！”又说：“龚古尔所写的（妓女）埃丽莎，在写妓女的文学中是娜娜的对手，可是她同热尔伟兹的女儿（娜娜）相比，根本没有生命！”

左拉平日既不寻花问柳，也没有任何艳遇，对烟花巷很不熟悉，怎样能写出这部小说呢？

左拉在《实验小说》中说：“一个自然主义的小说家想写一本关于戏院的小说……他第一要做的是搜集关于他要描写的世界的一切笔记。他认识某个演员，他看过某一出戏，这就是他的资料，最好的资料，在他身内成熟的资料。然后他开始作战，他请那些熟悉情况的人谈话……他参考书面资料……最后，他到现场观察，在戏院生活几天以熟悉每一个角落，在女演员化装室里度过几个夜晚……资料搜集齐备以后，他的小说就自己确定下来了。”

左拉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创作《娜娜》的。他平日经常同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和都德一起聚餐，他自己拙于辞令，大半时间沉默不语，只提些问题，却从这几位作家的谈话中得到大量关于上层社会生活的资料。为着帮助他写《娜娜》，龚古尔兄弟、都德、塞阿尔带他去拜访一些交际花，塞阿尔还把自己的笔记本借给他，而且带他到一个著名的老鸨家里去，使左拉在那里得到无数宝贵的资料。

左拉写好《娜娜》的提纲以后，写信向塞阿尔道谢：“十分感谢你的笔记。它们非常好，我全部用上了，晚餐尤其惊人。我真希望有一百页这样的笔记。我会写成一本好书的。如果你或你的朋友找到新的资料，再送来给我；我渴望得到一些亲身经历的东西。《娜娜》的大纲我已写好，我自己非常满意。我花了三天来创造人名，其中有几个我觉得非常成功。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有了六十多个人物。我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动手写，因为我还有许多细节要处理呢。”《娜娜》的大纲现在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其中一条是：“……萨比娜同米法是上层社会的解体，同《小酒店》象征下层社会的混乱一样”，另一条是：“娜娜，即安娜·库波，生于1852年，是异种的混杂焊接。受父亲的精神上的影响较大。”

不少批评家认为左拉在创作实践中突破

了自己所规定的创作方法，超越了自然主义，继承了现实主义，所以写出了杰作；或者说左拉在创作中凡是有所成就，都是由于左拉的现实主义倾向所造成的，左拉离自然主义越远，创作就越有成就。这种说法是把现实主义视为正宗的创作方法，而把其他方法都视为旁门左道。其实自然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同现实主义的关系就难舍难分，不少文学史家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把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都归入自然主义的行列。从文学史上说，古典主义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兴起、要求个性解放时期的产物；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反动，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自然主义继承现实主义，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自然主义并不排斥现实主义，这两者都追求客观的真实，主张通过社会调查和体验生活来积累资料，进行创作，因此它们在创作中不可能没有共同的东西。左拉说，自然主义文学“是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猛烈的反动”，却没有说自然主义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动。可见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是继承而不是排斥。所不同者，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物和生活进行选择、提炼、概括、通过细节的真实刻划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自然主义强调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认为必须以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为依据，去分析人的心灵、

肉体、情欲和社会行为。自然主义如果过分强调种族遗传等因素对人的影响，忽视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就不能正确地塑造出典型人物；反之，如果对这些因素仅仅加以适当考虑，主要力量还是放在“表现真实”上，就会与现实主义异曲同工，得到良好的创作效果。左拉创作的目的是要揭露“上层”和“下层”的疮疤，在描写社会的病态和病态的人方面，不管他主观上如何想强调遗传因素，客观上得到的效果是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而不是对生理的人进行解剖和分析，结果仍有可能塑造出典型人物，娜娜就是一例。

《娜娜》出版以后，受到“正人君子”的大肆攻击，咒骂左拉不道德。左拉的回答是：他自己是一个贞洁的人，从来没有沾染任何恶习；他只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生活，他的书中所写过的，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出一百个实例来，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包括那些咒骂得最凶的人在内。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比左拉的描写更丑恶，左拉仅仅对社会的弊病与堕落提出控诉，所以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道德的作品。

今天，《娜娜》被译成各国文字，在各国公共图书馆中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书籍之一，就是历史给了《娜娜》以最公道的评价。